

焦點評析

創新國家理論：直面兩岸關係問題與挑戰的使命

National Innovation Theory: The Era Mission of Fac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Challenges

國立中興大學  劉建軍 *Jian-Jun Liu*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ublic Affair
Fudan Universit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家理論是我們在討論兩岸關係時不能回避的話題。儘管很多普通民眾對高層政治興趣不大，但海峽兩岸幾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一旦把自身置於「兩岸關係」這一場域之中，我們內心深處都難以擺脫政治的約束和國家的勾連。國家和政治時不時會溜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臺灣人身份認同的迷思和在國際交往空間中的尷尬，就證明了普通人與國家議題、政治議題的勾連性。毫無疑問，「中國」作為一個極具廣延力的概念，已經確立了兩岸之間人際關係和「陸島關係」的底線。但不同的人對待這道底線的態度卻是不同的，捍衛者有之，肯定者有之，彷徨者有之，抵制者亦有之，否定者亦有之。作為研究者，我們有責任在紛繁複雜的國家理論面前殺出一條路，將兩岸關係帶入到一個澄明的國家理論之中。儘管這一學術努力是極為艱苦的。

毫無疑問，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政治發明。中國之外特別是

西方的國家理論，我認為大致就是兩大類別：一是神聖主義的國家理論，二是世俗主義的國家理論。前者強調國家的宗教屬性，後者強調國家的利益屬性。作為現代國家制度之父法國的阿爾芒·讓·普列西（Armand Jean du Plessis），即黎塞留樞機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就是世俗主義國家理論的代表者。歐洲近代興起的國家至上論就主張，為促進國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黎塞留提倡國家至上的觀念，並為了法國的利益義無反顧地付諸實施。在他的宣導之下，這個觀念取代中世紀的世界道德觀成為法國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作為世俗國家理論創始人之一的馬基雅維利，則認為宗教本身不再是一個目的，它已經變成統治者手中的一種工具；它不再是人的社會生活的基礎，而是在所有政治鬥爭中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這一武器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的力量。¹著名學者浦薛鳳就恰如其分地提出：馬基雅維利放棄道德，布丹放棄宗教。²而黎塞留的對手，費迪南二世，就是典型的神聖主義國家的代表。在費迪南心目中，國家是為了替宗教服務而存在，而非宗教為國家而生：「論國事，其對我等之神聖事奉重要之極，吾人不得時時以俗務為念，而須以上帝為仰望，唯以此為信仰之所在。」³神聖取向和世俗取向的國家理論是從西方理念—現實、主觀—客觀二元對立的文化基因以及教權—王權二元對立的制度基因中衍生出來的。近代以來的政教分離並沒有徹底導致世俗主義國家理論對神聖主義國家理論的顛覆和替代，恰恰相反，近代以來的世俗國家也在扮演著神聖國家的角色。歐美世界在全球範圍中的文化擴張正是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現代翻版。只不過東征的主角和推手由教會變成了國家。

所以，在二戰以後，國家所具有的神聖取向和世俗取向並沒有像近代那樣完成一種相互替代，而是非常奇特的組合在了一起，這顯然是與冷戰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有關聯的。冷戰強化了西方世界將其國家體系和政治

¹ 馬基雅維利，《論李維》（台北：商務印書館，2013年）。

² 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11。

³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8-52。

制度置於近乎神聖的地位，並試圖將其國家體系和制度模式推展到全球。因為冷戰既是經濟制度的對峙，又是意識形態的對抗，更是政治制度和國家形態的較量。因此，無論是將國家視為攫取最大化利益的經濟組織，還是將國家視為多元民主體系的構成者，都不自覺地將其國家理論推至一個近乎神聖的不容質疑的地位。其實質都在於神聖取向與世俗去選取向在現代性框架中的媾和與共謀。這樣的國家理論已經變成一種現代宗教，其本性就在於試圖訴諸顯在的暴力或隱蔽的暴力，使其主張在全球範圍中得以落實。這就是現代版的黑格爾所說的「上帝地球上的進軍」，也是凱西爾所猛烈批判的「國家的神話」。⁴美國是這新一輪國家擴張的領頭者，籠罩在美國精英頭上的天定命運，使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一意孤行。按照加拿大梁鶴年先生的看法，天定命運有三個層面：美國國民和制度（經濟、社會與政治）的道德性；宣傳以上制度去拯救世界和按美國模式去更新世界的使命；完成這項工作是神許下的必然。這些層面含有三個文化因素：「美國與眾不同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浪漫國家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天然優越」（Anglo-Saxon Superiority）。美國人相信民主共和制（republic democracy）是個「有關自由的偉大實驗」（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而天定命運是美國人的至高道德行為，勢在必行，而且行必有成。⁵現在回過頭去看看，源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國家擴張已經擾亂了世界範圍內的文化版圖和文明秩序。現代前是爭領土、爭榮譽；如今，在領土、榮譽之上，還加上意識形態之爭。現代前是王侯世族為個人、為家族而戰；如今，王侯世族仍在戰，但國家、民族也被牽進去了。意識形態、國家民族都有唯一真的意味，都帶有極端、排他傾向，因此戰爭無可避免。⁶諸多事實越來越證明了，中西兩大文明對國家、民族乃至民族主義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衝突和對立的。當

⁴ 恩斯特·凱西爾，《國家的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

⁵ 梁鶴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303。

⁶ 同前註，頁487。

我們回過頭去，把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原理與中國國家的形成原理做一對比時，就會發現其內在理論和目標指向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美國學者裡亞·格林菲爾德所說的：儘管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世俗主義的，但我們應該懂得，它只能在某種宗教環境下產生出來。它是某種特殊文明的產物。這種文明是一種獨特的、自我封閉的、自足的和自生的文化變體。…早就民族主義的那種文明是由猶太教的一神論宗教傳統為之奠定基礎的。通過讓一個上帝來統治萬物，猶太教一神論就將客觀現實展現為一個宇宙統一體，亦即一個始終有序的政體。（例如，很顯然，多神論文化不可能有這種概念，因此就像任何一種非一神論的象徵體系那樣，用各種不同方向的管道來疏通思想和情感。）將客觀現實視為一個有序的宇宙的概念，反過來極大地強化了人們對無序的敏感，因而使得基於無矛盾原則的邏輯登堂入室—這種邏輯後來被總結為亞裡斯多德邏輯學。民族主義誕生於失範（anomie）的時代，即16世紀英國都鐸王朝新的貴族統治時代，當時原有的世界觀與世紀經驗發生了矛盾，它只能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期待著現實是符合邏輯的，換言之，具有普遍心理意義上的邏輯事實上介入了正常的思維活動。因為民族主義是天生具有競爭性的，因此一種新的強大精神和支配欲望首先啟動了英國，然後相繼啟動了歐洲和由歐洲派生出的各個國家，很快就使它們能夠將自己文明的集體意志強加給全世界。⁷天生具有競爭主義和排他主義的民族主義以及由此孕育出來的國家，只能誕生於一神論的文明之中。這就從源頭上註定了中西國家形成原理的差異性。

中國的國家理論受西方國家理論的染指已經達百年之久。西方國家理論的最大弊端就在於它是零和博弈的始作俑者。同樣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西方人對它的理解是文化殖民和文化圍剿，中國人對它的理解是求同存異和通約化之。所以，西方的國家理論是排他主義的，中國的國家理論

⁷ 裡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3-4。

是包容主義的。以此邏輯，我們今天在面對兩岸關係時，是從西方國家理論中汲取破解手段還是從中國傳統的國家理論提取靈感與智慧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我認為，西方國家理論的對立性格和排他思維，對解決兩岸關係之困局，沒有太大的價值。我們要想破解兩岸關係之困局，一個重要的思路就是在謀取國家理論的突破。因為左右兩岸關係之趨勢的最後一道底線就是對國家的理解和對國家的定義問題。我們這些研究者應該敢於面對那道最為恒久、令海峽兩岸政治家最關心、且不斷觸及兩岸普通人心靈世界的那道「底線議題」。這個底線議題就是「國家議題」。它涉及到如下問題：如何重新定義國家？如何在特殊的兩岸架構中重新理解國家主權？如何重新理解個人與國家的關聯？如何重新定義國家利益？儘管我們一時難以提出系統性的國家理論，但至少我們可以在思維方式上求取創新國家理論的邏輯通道。

不可否認，所有關於現代國家的理論都是脫胎於歐洲持續不斷的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連綿獨斷的戰爭促成了歐洲的均勢體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的誕生，其實質就是保護和增值自身利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均勢。與關注歐洲民眾認同的歐洲國家理論不同，美國的國家理論更多地是精英主義的產物。一批律師彙聚費城起草的憲法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這一美利堅合眾國其實是美利堅合「州」國。在美國憲法獲得通過之後，美國依然面對著可怕的族群分裂、地區分裂等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且這一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解決。由此可見，西方國家體系的背後是族群之分、文化之分、宗教之分、地區之分。西方文明潛伏著永恆的追求唯一真的文化基因，⁸而且，每一個族群、每一種宗教都會宣稱自己擁有唯一真的權利和稟賦，那麼，從這一文化基因衍生出來的國家理論，自然是不寬容的、不和諧的、不關聯的。更為可怕的是政治學中所有關於現代

⁸ 同註5。

國家的理論都披著追求唯一真的外衣。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的思維方式和理論慣性去解讀兩岸關係，必然導致連綿獨斷的關於國家的理論戰爭和現實衝突。受西方國家理論染指太深、污染太重的中國國家理論，已經到了何去何從的地步了。現實的兩岸關係迫使我們必須具備創新國家理論創新的勇氣和行動。

中國的國家理論講求「合」，而不是「分」。錢穆先生認為，大一統的國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政治觀念。從政治觀可推廣到整個人生觀，乃至整個宇宙觀，中國此下思想學術俱從此發端。在錢穆先生看來，大一統國家的建立是中華民族最為偉大的政治成就。⁹錢穆先生認為，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跡。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與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刺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圍，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圍之征服。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鐸于一時，而中國溫暖則輝映於千古。¹⁰在梁漱溟先生看來，就是中國沒有經歷對客觀世界的改造這一環節而直接進入依靠人倫來組織社會和國家的路子。這是世界範圍內極為少見甚至是唯一的「文化早熟」。¹¹錢穆先生和梁漱溟先生所闡述者，其實就是中國國家

⁹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商務印書館，2005年）。

¹⁰ 錢穆，《國史大綱》（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3-14。

¹¹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2009年）。

的制度基因和文化基因。基因的力量在於延續和複製。國家理論之創新，不能不回歸這兩大基因。與此同時，我們又要敢於面對現實，使國家理論能夠容納和整合歷史上不曾出現的要素。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國家理論的創新，有兩條路不能走，一是西方講究排他性的國家理論通道，二是復古的天下主義禮治國家理論通道。排他性國家理論是獨斷的、狂妄的、暴力的，復古的天下主義國家理論是保守的、想像的、漠視現實的。任何理論的實現程度都是與其面臨的現實情境相互契合的。所以，基於我的觀察和思考，我提出了關聯主義的國家理論，以求教於各位。

一方面，關聯主義國家理論是從中國文化基因中抽取出來的；另一方面，關聯主義國家理論又是直面現實的。它拋棄了排他性國家理論和天下主義國家理論中「中心—邊緣」這一空間等級體系的二元區分，也告別了兩種理論中「文明—野蠻」這一文化等級體系的二元區分。西方排他性國家理論塑造出來的國家類型是所謂的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區分，天下主義國家理論塑造出來的文明國家與野蠻國家的區分。這兩種國家理論對化解兩岸關係之困局都於事無補。關聯主義國家理論塑造出來的則是將傳統與現實貫通在一起的「關聯國家」這一類型。關聯國家與傳統的聯邦或邦聯沒有任何共同語言。聯邦和邦聯關注的是國家之間的界限，而關聯國家關注的則是內部各要素的聯結。其重心有兩個，一是要發生關係，二是要締造聯結。德國的統一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從要素上來說，關聯國家的確立是以語言關聯、經濟關聯、社會關聯、文化關聯、人際關聯為基礎的。從哲學上來說，關聯國家是以平衡為基石的。從中國文化基因的角度來說，國家與生命、物質一樣，均有陰陽兩極。政治家對國家議題的解讀為陽，普通民眾對國家議題的解讀為陰，高政治（high politics）之間的關聯為陽，低政治（low politics）之間的關聯為陰。中國自古以來的國家理論就是講求這一陰陽之間的和諧與平衡。事實上，超越兩岸衝突和矛盾的關

聯已經客觀存在，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文化世界中，這一關聯已經難以打破。

毛澤東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共七大上做過一個很有名的報告：《論聯合政府》。這篇報告就是要破解抗戰勝利之後中國國家建設的難題。我們是否可以寫一篇《論關聯國家》的東西呢？這是否可以成為破解兩岸關係之困局的通道呢？西方文明認為不對的對立面必然是不對，錯誤的對立面必然是正確。但在中華文明中，不對的對立面可能還是不對，錯誤的對立面可能還是錯誤。正確不在於錯誤的對立面上，而在於兩個錯誤端點的中間。正如在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兩元對立的公共物權和私人物權一樣，存在於兩者之間的關聯物權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賴以存在的基礎。關聯主義國家理論的奧妙和魅力就在於開闢第三條道路，在關聯國家的成長中開闢互聯互通、共生共榮共用的道路，其中暗含著對傳統的主權理論和治權理論的突破。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在關聯國家形態中，主權可以共用共用，治權可以並立並存。這與西方僵化的、脫胎於一神論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是不一樣的。其實，作為歷史範疇的主權，其政治哲學原理在於它是抽象性與具體性、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¹²所以，辯證地看待國家主權是特別重要的。國家主權在理念上是絕對的不不容質疑的，但在現實的實踐中和歷史的背景中，它又是相對的和受到諸多限制的；國家主權在本質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理念，但在組成結構上它又是有層次的，既有核心的價值構成，又有邊緣的表現形式。¹³創新國家理論，破解兩岸關係困局的前提有兩個：一是擺脫西方從一神教和霸權邏輯中孕育出來的國家理論，二是將中國國家形成原理與新的現實相結合。汪道涵先生提出的「共同締造論」、臺灣大學張亞中宣導的「統合論」(integration)、廈門大學劉國深提出的「國家球體理論」，都暗含著創新國家理論的勇氣。¹⁴

¹² 肖佳靈，《國家主權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237。

¹³ 黃仁偉、劉傑，《國家主權新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5。

¹⁴ 張亞中，《統合論》(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4年)。

我提出的關聯主義國家理論，將對國家的理解從上層轉移到了下層，即將古典的國家理論從一種封閉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使新型國家形態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之上。從歷史上來看，有著語言關聯、經濟關聯、社會關聯、文化關聯、人際關聯的國家和民族，中間無論經歷多少曲折，最終都是走向一體化的，最終都是走向統一的。尤其是基於「合力」而形成的中華民族，更加強化了這樣一種關聯的稟賦、氣質和靈魂。這與基於「分力」而形成的歐洲民族是不同的。我提出的關聯主義國家，就與張亞中先生關注的文化統和、貨幣統和、經濟統和、身份認同和安全認同與國家參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¹⁵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地說，在相互關聯的經濟空間、文化空間、網路空間和社會空間中，只要經濟主權、文化主權、網路主權、數位主權不被分割，由兩岸中華民族共同締造和共同享有，那麼至高性、唯一性、不可分割性的國家主權就有了賴以存在的基礎。

西方的國家理論是建立在等級性的立體社會之上的，它講求權力的歸屬。西方所有的國家理論和政體理論都是以指掌權力的人數作為邏輯起點和劃分標準的。中國的國家理論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和地區之間橫向聯結的平面社會之上的，它講求的是權力的為公。西方國家被階級所左右，注重縱向調和。選舉不過是高層階級和底層階級的調節器。中國國家講求國家與處於水準層次的家庭、社區和地區的關聯，注重橫向聯結。故理解中國國家建設道路不能從西方文明出發，而應該從中華文明出發。

我覺得兩岸關係的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重新理解國家。目前兩岸關係中的挑戰似乎不是來自現實層面，而是來自理論層面。臺灣人的身份焦慮與身份認同迷思，並不僅僅是一個生活議題，也是一個國家議題。破解兩岸關係困局呼喚著兩岸政治家和學者的理論創新能力與理論創新勇氣。因為，超越現實、指導現實的理論能夠消解個體焦慮與群體迷思，

¹⁵ 同前註，頁 147-162。

並把他們帶入到一個更加澄明的境界之中。就像 17、18 世紀歐洲崛起的民族國家有效填補了歐洲思想世界的邏輯真空一樣。失范的心靈世界和現實世界對新型理論的需求就顯得特別旺盛。故我關心的不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實務。我更關心的是我們海峽兩岸能否對國家理論有所創新。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凡是偉大的國家都是在國家理論和國家制度方面有其重要貢獻的。所以，我們這些研究者要想不回避問題、敢於直面未來挑戰，就要有創新國家創新理論的勇氣與行動。這是時代賦予給我們的責任。

責任編輯：盧信吉

